

抄録公開講座「モダンの文学、モダンなアジア：一九二〇、三〇年代の上海、台北、ソウル、そして福岡」

波瀾, 剛
九州大学大学院比較社会文化研究院：准教授

李, 征

呉, 佩珍

キム・イエリ

<https://doi.org/10.15017/1903750>

出版情報：九大日文．29, pp.117-128, 2017-03-31．九州大学日本語文学会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摘录 公开讲座“摩登文学、摩登亚洲——1920、30年代的上海、台北、首尔和福冈”

波瀾剛、李 征、吴佩珍、金礼利

作为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基盘C“昭和摩登的开展/变化——1930~1940年代东亚地区文化翻译的政治学”(课题编号:26370430)的一环,2015年7月到2016年1月期间,笔者与福冈市文化馆于福冈市赤炼瓦文化馆共同举办了四次公开讲座。讲座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以及韩国的各位讲师,就各地域的“摩登”和“现代主义”进行了介绍。每次前来参加讲座的人大致在15~20人左右,四次下来合计60~70人参加了此次的活动。由于无法涵盖讲座的全部内容,借此杂志特摘录部分内容以供参阅。

首先,关于各讲师及讲义题目的介绍如下:

- 第一讲 李征(复旦大学)——《纸上之行:关于中国近代文学中日本表象的流通及再生产》
第二讲 吴佩珍(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台湾现代主义中的文学与绘画:以1930~1940年代为中心》
第三讲 金礼利(江原大学)——《1930年代韩国现代主义文学与李箱》
第四讲 波瀾剛(九州大学)——《摩登都市福冈的文学与文化》

既为摘录,本应按日程先后顺序来介绍较为妥当,但考虑到各讲的内容,笔者认为,不拘泥于时间顺序的话更利于内容上的理解。因此,接下来笔者将以第一讲、第四讲、第二讲及第三讲的顺序,在各讲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介绍。

李征的第一讲主要是围绕中国近代文学奠基人之一的郭沫若展开。其博士论文为《表象中的上海》,主要是关于1920~1930年代上海的现代主义与日本现代主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在此次讲座中,其讲义内容主要围绕“中国近代文学”与“福冈”这两者间的关系展开。

讲义的内容核心围绕的是中国近代作家郭沫若(1892-1978)的初期作品《牧羊哀话》(短篇小说,1919年11月15日,发表于杂志《新中国》第1卷第7号)。该作品是郭沫若在日留学初期所写,并作为中国近代文学成立期白话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广为人知。

郭沫若,除作为作家进行文学创作之外,还有历史学者和政治家的身份。其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留学期间,与郁达夫等人成立了“创造社”,该社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团体之一发挥了不小的影响。政治方面,1950年代后,郭沫若还曾担任过中国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以及全国政协副主席,其作为政治家也十分活跃。

郭沫若于1914年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一年半后,转学到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并于1918年夏天,从第六高级中学毕业后进入到九州帝国大学学习。也正是从此时,郭沫若开始了文学创作。其作品多为诗歌,代表诗集《女神》更是被评为中国近代诗的杰作。此外,从1919年夏天开始,着手翻译了歌德的《浮士德》。同年,五四运动兴起。在这一时期所发表的《牧羊哀话》,作为其小说的处女作,被认为具有特殊意义。

藤田黎那的评论指出,《牧羊哀话》是以朝鲜为舞台,将中国的“排日”情感借由朝鲜人之口讲述的一篇小说。郭沫若本人在《创造十年》中对该小说的创作背景也有所阐述。即其直接创作意图是来自于对当时“山东问题”(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和朝鲜殖民地问题的关注,并将此关注借由悲哀的牧羊少年少女的故事表现出来。

《牧羊哀话》是与郭沫若在日本留学密切相关的一篇小说,受到了其最初赴日经历的影响。1913年,郭沫若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先在北京乘坐京奉线铁路,经山海关、奉天、安东后进入朝鲜半岛,并在1913年的最后一天抵达釜山,留宿于中国领事馆后,于1914年1月13日乘船到达东京,由此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留学生活。《牧羊哀话》的故事正是以现朝鲜与韩国交界处的金刚山为舞台展开。

《牧羊哀话》故事的一开始便提到了“金刚山”。“金刚山万二千峰的山灵，早把我的魂魄，从海天万里之外，摄引到朝鲜来了。我到了朝鲜之后，住在这金刚山下一个小小的村落里面，村名叫着仙苍里”。此处虽有详细的风景描写，然而对叙述者“我”为何来朝鲜却只字未提。“村上只有十来户人家，都是面海背山，半新不旧的茅屋。家家前面，有的是蒺藜围墙；更有花木桑松，时从墙头露见。村南村北，沿海一带，都是松林，只这村之近旁，有数亩农田，几园桑拓。菜花麦莠，把那农田数亩，早铺成金碧迷离。那东南边松树林中，有道小川，名叫赤壁江”。其中，其对于殖民地的思想感情也夹杂在风景描写之中，“汇集万二千峰的溪流，暮暮朝朝，带着哀怨的声音，被那狂暴的日本海潮吞吸而去”。

该小说在故事情节的构思上设计地较为复杂。除重要登场人物“我”之外，还有六人。①闵崇华（李朝的子爵，后辞退官位）、②佩萸（闵崇华之女，牧羊少女）、③李氏（闵崇华后妻）、④尹妈（“我”留宿家中的主妇，故事借由她口展开）⑤尹石虎（尹妈的丈夫，国贼）⑥尹子英（尹妈的儿子，长佩萸一岁）。“我”在朝鲜人尹妈家中留宿的那一夜，从尹妈那儿得知了悲惨的故事。小说的结构便以尹妈口述故事的形式展开。

从尹妈那儿，“我”听说名为“佩萸”的牧羊少女本是名门千金，然而如今却沦落成牧羊少女，个中缘由让“我”疑惑不解。听尹妈讲述，“佩萸”本与其父闵崇华一同住在京城。其父本是李朝的子爵。数十年前，反对奸臣同“外人”（日本人）缔结“合并条约”，然朝廷完全不理睬其意。闵崇华见大势已去，无奈辞去官位携家眷离开京城移居乡下。尹妈当时就是侍奉小姐“佩萸”的下人，其夫尹石虎和其子尹子英也同为闵府下人。

闵崇华的后妻李夫人也是名门千金，自幼便在日本接受教育。毕业后，先后远赴纽约、伦敦、巴黎、维也纳等西方大都市，在国外停留的时间远多于在朝鲜。22岁时回国的李夫人恰逢闵崇华的前妻金夫人逝世满三年，不久就作为闵崇华的继室入了闵府。这些都还是闵崇华弃官之前的事。在当时京城，李夫人还是名满全城的“社交家”，与其交往的大都是日本人。

闵崇华移居田园后，养了数十头羊，并将这牧羊的工作交给了少年尹子英。佩萸也偶尔和子英一起牧羊。但后来，李夫人因不满乡下生活，向日本人告发了闵崇华的反日思想，（可能受到日本高层的指示）并参与企图谋杀闵氏。少年尹子英之父尹石虎向来好吃懒做，毫无意外地也一同加入了谋杀闵氏的计划。而与此父截然不同，子英实为堂堂正正的朝鲜少年。在察觉到父亲等人的阴谋后，本想告知闵氏，却在途中被其父误认成闵氏遭到暗杀。

小说中，闵崇华的反日思想，是通过诗《怨日行》象征性地表现出来。字面上来看，“行”字仅代表古体诗的一种诗体，但在笔者看来，该字也是作者郭沫若为表达“怨日”之意有意为之，从中不难领会“怨恨日本”这一反日之意。诗最后署名为“大遗民闵崇华”。在子英被杀后，闵氏得知全部内情后勃然大怒，其妻李夫人也因阴谋败露自杀而亡。子英之父尹石虎潜逃后是生是死、是疯是傻也不得而知。其后闵氏剃度出家，佩萸则一面伴其左右，一面继续看着羊群。

小说最后以“我”的一场梦结束。在梦中，子英的墓地突然变成一个舞蹈场。似有一对妙龄男女裸身共舞，而两人周围还有众多羊儿似人站立而舞。此外，狮子、豹和虎也在其中。恍惚间，突然一个矮小的凶汉携刀向“我”脑袋砍来，“我”猛地惊醒。还未盼得天明，“我”便决意动身离开了这“断肠地方”“伤心国土”，“谁还有铁石心肠，再能彀多住片时半刻呢”。

短篇小说《牧羊哀话》，执笔于1918年春，最初发表在1919年杂志《新中国》第1卷第7号，作为郭沫若的小说处女作被广泛认可，影响深远。在杂志上发表不久后，同名小说集（民国新文学《牧羊哀话》，三联出版社）也随即问世。此外，还以作家自选集、作家文集、作家全集等形式反复出版为广大读者所阅。在谈到读者对该小说的接收形式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将小说从文字符号转换成图画符号这一点，即“连环画”（类似于日本的漫画）

版《牧羊哀话》（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年3月）的发行。“连环画”作为伴随文字的绘本，其形式使小说中关于日本的表象被具象化，为肉眼所能感知，并广泛流通于孩童们的世界。与文字的表现方式不同，图画将小说中日本人的形象直观具体地表现出来，一眼便能感知。近几年，“连环画”《牧羊哀话》以翻印的形式被再次出版，可以预想这一影响在今后仍将持续。

包括韩国近代文学奠基人李光洙在内的各东亚文学家，当我们在思考他们的作品以及思想中所体现的“摩登(近代)”时，与鲁迅并称为“奠基中国近代文学双壁”之一的郭沫若，其小说的内容能给我们很多启发。此外，从福冈与中国近代文学的关系来看，值得一提的是，与郭沫若一样曾就学于九州帝国大学的陶晶孙（1897-1952）回国后便在上海开始了新感觉派文学的创作。

以上，在谈到1910年代末中国文学家与日本以及韩国的关系后，接下来，我们将话题转向将重心放在1920年代~1940年代的第二讲。在此，先对若干概念进行补充。首先，我们所讨论的文学中的“modern（摩登、近代）”被设定为一个时代，其区分主要是在①“modernization”（城市化=近代化）中，②“modernity（都市群体与个人间的隔阂感）”最为引人关注，而③modernism（新文学表现·运动）则同时体现前两者。因此，从广义上来限定“现代主义”的范围的话，其几乎正好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的“近代”重合，狭义上，也可以将其定义为1920年代~1930年代间萌生的新现象。

此外，在日本大正末昭和初这段时期，以“modern girl（摩登女孩）”为开端，“摩登”一词成为了当时的流行语。狭义上“现代主义”文学的时期正好与历史上的这一流行语的始发期重合。首先在日本使用“摩登女孩”这一词的，是北泽秀一发表在杂志《女性》的一篇文章《摩登女孩》（1924年8月）。紧接着第二年，新居格发表了文章《关于近代女性的社会考察》（《太阳》1925年9月），同样在该期杂志上，木村毅也发表了《近期小说中出现的女性——关于被艺术化后的摩登女孩的考察》。此外，清泽冽的《摩登女孩》（金星堂，1926年）、片冈铁兵的《关于摩登女孩的研究》（金星堂，1927年）等也相继发行，由此“摩登女孩”成为了当时的流行语。

此后，《近代生活座谈会》（《文艺春秋》，1928年1月）《摩登生活漫谈会》（《新潮》，1928年1月）等座谈会，内田鲁庵的《谈摩登》（《中央公论》，1928年11月）、大宅壮一的《摩登层与摩登相》（《中央公论》，1929年2月）、瀬沼茂树的《现代主义和其诸相》（《一桥文艺》，1929年5月）、特集《摩登·日本近景》（《中央公论》，1929年10月）、平林初之辅的《昭和4年的文坛概观 8·现代主义全盛》（《新潮》1929年12月）、调查《1.应讴歌赞美的摩登诸相、2.应排斥打击的摩登诸相》（《摩登日本》，1930年10月）、龙胆寺雄的《现代主义文学论》（《新文学研究第二篇》1931年6月）等，众多评论和特集也都相继登场，这一时期冠以“摩登”的流行语词典也一一出版。

围绕“摩登”的流行并不仅限于东京，在地方城市也能看到同样趋势。在第四讲中，波濑刚以福冈为例，围绕摩登都市文化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讲解。

大正末昭和初的福冈，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继完善，以百货店和咖啡馆为代表的摩登消费文化据点也相继诞生。在文学活动层面上也能感受到摩登文化的兴盛。进入昭和时期后，继九州帝国大学文艺杂志《筑紫文学》创刊后，以山田牙城、原田种夫、星野胤弘等人创办的诗刊《癡癡病院》和今井慎之介的诗刊《众像》为代表，《先发队》《自由艺术》《九州诗坛》等诗刊也相继问世。此外，1935年左右，《九州艺术》《九州文化》《九州文坛》《文学会议》等综合性文艺杂志先后发行，文学活动的开展生气勃勃，地方文坛蓬勃发展的气势十分高涨。但其中，梦野久作和火野苇平等著名文学作家被排除在外。

关于这一时期的具体情况，在由YUMANI书房出版的“合集·摩登都市文化”第90卷《博多的都市空间》（波濑刚编，2013年）收录的文章中有所涉及，此处便不再赘述。如若重

新从东亚这一地域范围的角度来思考，就不得不提 1933 年创刊的杂志《博多春秋》的主编西口紫溟。西口紫溟出生于熊本，结束在早稻田大学的学习后，1918 年到 1922 年都在台湾生活。这期间，其工作于台湾新闻编辑局，先后创办了短歌杂志《人性》、歌集《南国之歌》《生蕃神话》和《南国物语》。1922 年回国后，在下关市马关每日新闻社担任主编兼社会部长，后又在 PLATON 社担当杂志《苦乐》的主编，并发掘出插画家竹中英太郎。也因此，梦野久作与竹中英太郎得以结识。

除了前文中介绍的郭沫若和陶晶孙等在日中国留学生之外，也有像西口一样辗转在东亚各地，从事日本摩登文化创造事业的日本人。因此，除了在此次讲座中谈及的福冈、首尔、上海、台北等地外，包括其他都市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的摩登文化和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共时性和相互间的交流及渗透也值得思考和研究。一直以来，多数的研究都以各国文学史为轴心展开，但在加深各国彼此间交流理解的层面上，除相互之间进行比较外，从各国文学及文化史实则横跨了多个地域这一点出发着手研究显得更为重要。从这四次公开讲座的参与情况便可了解到，四次讲座全都参加的人几乎没有，大多都只是参加其中的一两次。这可能是因为参加者各自受限于自己感兴趣的地域，亦或是因为活动在组织运营上存在问题。但由此，我们也认识到相关研究也应着眼于欧美摩登和现代主义，并由此广泛引起人们对东亚摩登及现代主义的关注。

言归正传，第二讲的内容主要围绕台湾文学和美术展开。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始于 1932 年由台湾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的“台湾艺术研究会”的成立。1933 年，该研究会机关文学杂志《福尔摩沙》（全 3 号）开始发行。在创刊辞中有这样一段话，“台湾，在地理上拥有热带特有的自然风貌；在政治和人种层面，因曾受编为中国领土，故混居着高砂族人、台湾人和内地人。（中略）台湾青年们！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自由和丰富，我们有必要通过我们青年之手开始开展台湾文艺运动。（中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通过我们的文艺创造力去创造一个真正的‘美丽之岛’”（《福尔摩沙》创刊号，1933 年 7 月）。其成员有王白渊、张文环、吴坤煌、巫永福和翁闹等人。

提到台湾现代主义及代表作家，就不得不提以下这些文人。巫永福（1913-2008），生于台湾南投县，号永州，笔名田子皓，1925 年进入名古屋五中学习，毕业后进入明治大学文艺学科，受教于菊池宽、横光利一等人，深受当时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特别是以横光利一为代表的新感觉派的影响。其发表了《首与体》（《福尔摩沙》创刊号，1933 年 7 月）《红绿贼》（《福尔摩沙》第 2 号，1933 年 12 月）《黑龙》（《福尔摩沙》第 3 号，1934 年 9 月）《爱困的春杏》（《台湾文艺》第 3 卷第 2 号，1933 年 7 月）等作品。其中，处女作《首与体》被认为受到了横光利一《头与腹》的影响。写作手法也受到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影响，作品中“意识流”、“心境描写”等特征明显。题材上来看，其作品多以日本为舞台，以“都会”、“恋爱”为主题（例如《首与体》《山茶花》等）。此外，取材于台湾的作品则多描写下层社会和无产阶级（例如《黑龙》《爱困的春杏》）。

翁闹（1910-1940），生于台湾彰化，1940 年逝世于东京。台中师范学校毕业后，执教于员林公学校。1935 年前往东京，实现了自己活跃在“中央文坛”的梦想。虽然创作时间仅有短短六年，但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日语文学作家中，其属于创作甚丰的一人。除处女作诗歌《寄淡水海边》（《福尔摩沙》创刊号，1933 年 7 月）外，代表作还有《音乐钟》（《台湾文艺》第 2 卷第 6 号，1935 年 6 月）《懋伯》（《台湾文艺》第 2 卷第 7 号，1935 年 7 月）《残雪》（《台湾文艺》第 2 卷第 8·9 号，1935 年 8 月）《罗汉脚》（《台湾新文学》创刊号，1935 年 12 月）《可怜的阿蕊婆》（《台湾文艺》第 3 卷第 6 号，1936 年 5 月）《天亮前的爱情故事》（《台湾新文学》第 2 卷第 3 号，1937 年 1 月）等。其中，《音乐钟》《残雪》《天亮前的爱情故事》等都是以东东京为题材的作品，因其受到“恋爱至上主义”的影响，作品多以“恋爱”为主题，作品中心理描写和“独白体”等特征明显。《懋伯》

《罗汉脚》《可怜的阿蕊婆》等作品则取材于台湾农村，以台湾农村为舞台，描写主人公在“近代化”夹缝中的生存姿态。但比起描写城市与农村的隔阂，其作品更多的是突出强调近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矛盾。同前者一样，这类作品中心理描写和“独白体”也比较多见。其作品倾向于新感觉派，因而被同时代的其他台湾作家评论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失败作品”。

杨炽昌（1908-1994），生于台南，笔名水荫萍、柳原乔、岛亚夫等。1930年进入东京文化学院学习，留学期间常有诗作发表于《椎木》、《神户诗人》、《诗学》等日本杂志。1934年，与台南盐分地带的同人一同发行了诗刊《Le Moulin》（1933年10月-1934年9月）。自1933年起，担任《台南新报》学艺栏主编，1939年加入“台湾诗人协会”。醉心于西胁顺三郎，将其提倡的超现实主义手法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并将该思潮引入台湾文坛。其处女诗集《热带鱼》（BON书店，1931年）本预定通过当时的现代主义代表出版社“BON书店”出版，却在即将出版前遗失。其文学作品特征在于通过运用超现实主义手法，突出刻画台湾的热带风土相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美术。作为台湾近代美术的推动者，有两位日本人不得不提。石川钦一郎（1871-1945），出身于日本静冈县，留学于英国学习水彩画。其后，以水彩画为开端的台湾近代美术的发展也是得益于他的推动。在台湾新美术运动中，作为最早的画家社团而为大家熟知的“七星画坛”（1924年）和“台湾水彩画会”（1924年）也都是由他在台湾师范学校的学生组织成立的。

另有一人是野兽派的传承人盐月桃甫（1886-1954）。生于日本宫崎县，1912年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1921年来到台湾，执教于台北高等学校和台北一中。与石川不同，盐月专攻油画，并将西方美术流派、印象派、野兽派、超现实主义、立体派等引进到台湾美术教育的课程中。其以1930年雾社事件中茫然自失的泰雅族母子为题材的代表作《母》（烧毁于战火中）尤为著名。

此外，由西洋画画家石川钦一郎、盐月桃甫及东洋画家乡原古统、木下静涯四人组织成立的“黑壶会”，每年都会举办展会发表新作。后在台湾总督府的支持下，这四人于1927年成立了“台湾美术展览会”（台展），后发展为“府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近代美术的代表画家也陆续登场了。黄土水（1895-1931），出生于台北，雕刻家。进入国语学校（后为台北师范学校）后，因其雕刻才能被梅村老师认可，经校长推荐，进入到东京美术学校学习。后成为高村光云门下弟子，与其子高村光太郎私交甚好，并受到了他后印象派手法的影响。1919年，因作品《山童吹笛》入选“帝国美术展览会”（帝展），他成为了第一位台湾入选者。其后，作品《鹿》《甘露水》（入选第3届帝展）《郊外》（入选第5届帝展）也相继入选。其毕生的创作都取材于台湾农村风景，并通过西欧的创作手法写实性地表现出来。其作品代表着台湾摩登（近代）美术的特征。

陈澄波（1895-1947），生于嘉义，洋画家。1913年国语学校入学后，接受图画教育。在石川钦一郎第二次来到台湾后，跟随石川学习绘画。1924年被东京美术学校录取后，师从于田边至和冈田三郎。其入选1927年第7届帝展的作品《嘉义街外》，通过文艺复兴后的透视表现手法展现了家乡嘉义的风貌。1929年到1933年期间，历任上海新华艺西洋画科主任、昌明艺专艺教科，活跃在上海画坛。1933年以后，回到台湾后的陈澄波任职于台阳美术协会。1947年，因卷入二二八事件，在嘉义站前被国民军公开枪杀。是台湾近代画家的代表之一。

此外，还有战前唯一的近代女性画家陈进（1907-1998），生于新竹，东洋画家。第三高女在学期间，得到美术教师乡原古统的认可，毕业后进入到东京女子美术学校学习。在日留学期间，受教于镝木清方等人学习美人画。1927年，其三部作品《姿》《朝》《罌粟》都入选第1届“台展”。虽为女性画家，却与林玉山、郭雪湖并称为“台展三少年”。1934年，其入选第15届帝展的作品，是在她归省时，以其姐陈新为模特，通过日本东洋画的手法，

描绘出身穿当时上海最流行的“长衫”的台湾女性合奏月琴和笛的场景。也正是以此次入选为契机，她成为了台湾第一位高等女学校的女性教师。1930 年成为台阳美术协会会员，后又担当“台展”审查员及“府展”推荐部门画家。

一直以来，类似以上这些关于台湾文学和美术的介绍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但近些年，在台湾，类似的研究不断深入发展，可以期待今后相关的日语文献也将越来越丰富。

最后，第四讲的韩国篇围绕一位横跨建筑、绘画、诗、随笔、小说等众多领域的作家展开。李箱（1910-1937），被评为至今为止众多韩国作家中最为独特且最富天才的作家，也是韩国现代主义作家的杰出代表。在其活跃的 1930 年代，他被众评论家称为“朝鲜最杰出的现代主义者”，而在距他逝世近 80 年后的今天，他依旧被称为“韩国最杰出的现代主义者”。

李箱，诗人、小说家、随笔家。与此同时，他还是画家、插画家和建筑家。更准确地说，他并非仅仅是诗、小说和绘画的创作者，更是超越了诗、小说等文学和艺术本身界限的一位艺术家。因而，对其作品的种类划分十分困难。诗与随笔、诗与绘画、小说与随笔等，李箱往往不受各领域的限制，在这几者间游刃有余。可以说，李箱和如今的众多现代艺术家们一样，能在各领域间来去自如，是韩国第一位跨领域、综合多能型艺术家。

提起 1930 年代的韩国现代主义文学，就不得不提“九人会”这一现代主义艺术团体，李箱便是“九人会”的核心成员。除他外，还有郑芝溶（1902-1950）、李泰俊（1904-1956）、金起林（1908-?）、朴泰远（1909-1987）、金裕贞（1908-1937）等人。该团体的独特性就在于名为团体，实则不具有“团体”的性质。他们并没有统一主张和宣扬自身独特的文学理念或志向，也正因此仅被作为单纯喜欢文学的青年团体介绍给世人。他们并非像 1925 年成立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家团体 KAPF（Korea Artista Proleta Federatio）一样，向世人打出自己的行动纲领和组织理念，或是选出组织的领导人物。然而，虽然没有明确的组织理念和统一的文学志向，成员间彼此却有着深深的文学纽带意识。

占据韩国 1930 年代现代主义核心位置的李箱，对经由日本传来的西方近代知识和文化并非是一个毫无批判一味接受的“modern boy”。作为憧憬近代化的“modern boy”，同时也是朝鲜最杰出的现代主义者，李箱敏锐地捕捉到近代化进程给世界带来的诸多问题，并通过作品予以强烈的批判。而其之所以对自己身处的“摩登”世界抱有如此强烈的批判态度，与他作为殖民地知识分子这一身份有着莫大的关系。殖民地朝鲜，作为沦为被日本帝国主义掠夺的对象，这一现实本身可以说正是这熠熠生辉的近代化世界背后的阴影。

李箱恰巧出生于日韩合并的 1910 年。在复杂且不幸的家庭中长大的李箱，自小性格内敛，比起文学，更早在绘画方面显示出兴趣。然而由于家庭关系，无法继续绘画之路的他于 1926 年 4 月，进入京城高等工业学校学习。作为现首尔大学工科前身的京城高工，是日本在朝鲜设立的一流理工系官立专门学校，旨在培养促进殖民地统治和发展的高级技术人才和经营人才。

李箱在此学习数学、掌握了以数字和线为基础的设计图、鸟瞰图，以及蓝图的构图方法。其在京城高工学到的建筑学知识可以说为他的文学创作插上了想象的翅膀。事实上，这样的建筑学式的想象力在李箱的文学世界里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其同主题系列诗歌《鸟瞰图》、《鸟瞰图》、《三次角设计图》、《建筑无限六面角体》等便是代表。尤其是在《三次角设计图》、《建筑无限六面角体》等作品中，李箱将出现在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独特时间理论诗意地表现出来。由此可以看到，他的诗有着非常前卫的一面。

但是对建筑学的兴趣并没有完全冷却掉他对绘画的热情。从京城高工毕业后，任职于朝鲜总督府建筑部门的李箱，在 1931 年第 10 届朝鲜美术展览会中展出了作品《自像》并入选。该作品被当时的美术家评论道：“作品里能感受到他内心努力想展现一些新东西。”

入选 1931 年朝鲜美术展览会的这部作品，或许是作为建筑家的李箱，以绘画的方式发挥了其在建筑事业上所没能发挥的、富有创造性和艺术性想象力而取得的成果。除入选展会

外，1930年12月，李箱还曾投稿给“朝鲜建筑会”，参与其学会杂志《朝鲜和建筑》封面设计的有奖征集，并先后斩获一等奖和三等奖。而其当选为一等奖的作品从1931年1月到12月一直被用作杂志《朝鲜和建筑》的封面。其后，李箱还为“九人会”成员朴泰远的小说作插画，并主导编辑了1936年出版的金起林诗集《气象图》，此外还自己出版发行了独具一格的摩登诗集。不仅仅在文学领域，可以说李箱是一位活跃在艺术各领域的前卫艺术家。

然而李箱却身患肺结核，健康状况堪忧。在1930年代，肺结核就是不治之症。也因此，其作品大多都表现出他对死亡不知何时到访的恐惧，以及对自己身处这无奈境地的绝望。

李箱因病无法继续工作，遂前往地方温泉进行疗养。在这期间，他“命运般”地遇到了他唯一称作“妻子”的恋人“锦红”。就目前所掌握的相关资料来看，李箱先后有三位恋人。第一位就是锦红，第二位是通读前苏联作家高尔基全集、有教养且知识丰富的咖啡店女服务员，第三位则是1937年，李箱在东京垂死之际，陪伴在他身边的卞东琳。而其中，最知名的是在其小说《翼》中登场的锦红。

《翼》这部小说一开始便营造了抑郁且充满无力感的氛围。故事围绕身为妓生的妻子和完全没有经济收入的无能丈夫展开。这位无能丈夫便是以李箱自己为原型，作为妓生的妻子则是以锦红为原型。锦红小李箱两岁，在温泉旅馆做着妓生的营生。朝鲜时代的妓生，比起给两班贵族倒酒和出卖自己肉体的妓女，她们更是接近于艺术家的存在。也因此，她们虽然身份低微，却也不会任由两班贵族对自己无礼放肆。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朝鲜的这一文化日渐歪曲。妓生沦落成跟廉价居酒屋的陪酒女或卖春妇毫无二致，成为了十分卑贱的存在。而锦红便是这没落的妓生、卑贱的卖春妇。

然而，掌握着近代先进知识和文化的精英李箱爱上了卑贱的锦红。在《逢别记》这部小说中，李箱写到：“锦红成为了我的妻子。我们夫妇俩两情相悦。决定相互不再过问各自过去的事。说起过去，于我而言其实并没有什么值得提及的过去。但就算这样，与锦红定下的不再过问过去的约定也不会改变”。他们像这样命运般地相知相爱，却情路坎坷，最后以不幸告终。但是，将这世上最为卑贱的卖春妇当做自己妻子，可以说李箱在当时是一个相信自己比谁都能幸福美满生活下去的纯粹之人吧。

家庭不幸、身患不治之症、爱情无疾而终，如此看来，李箱称得上是一个一直在同家庭、疾病和爱情战斗并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的悲哀之人。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在深感自己时日不多时，毅然拖着病体来到东京的人。在东京，李箱在病痛和对死亡的恐惧中，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努力让自己的短暂一生在文学和艺术上开了花结了果。

以上，通过公开讲座的各个内容，我们大致了解到了中国大陆、台湾、韩国以及日本各自关于“摩登”“现代主义”的情况。此外，讲座中涉及到的参考文献如下。

公开讲座“摩登文学、摩登亚洲”参考文献（*副标题省略）

城山拓也《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世界》勉诚出版 2014年
铃木贞美・李征 编著《上海100年》勉诚出版 2013年
铃木将久《上海现代主义》中国文库 2012年
李征《表象中的上海》东洋书林 2001年

和田博文等 编《言语都市・上海》藤原书店 1999年

河原功《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研文出版 1998年
垂水千惠《台湾的日本文学》五柳书院 1995年
藤井省三《台湾文学这一百年》东方书店 1998年

山口守 编《讲座 台湾文学史》国书刊行会 2003 年
阮斐娜《帝国的太阳下：日本的台湾及南方殖民地文学》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 2007 年

川村湊《首尔都市物语》平凡社新书 2000 年
金振松《在首尔开舞厅》法政大学出版会 2005 年
申明直《幻想和绝望》东洋经济新报社 2005 年
中根隆行《“朝鲜”表象的文化志》新曜社 2004 年
南富镇《近代文学中的“朝鲜”体验》勉诚出版 2001 年

井上精三《博多大正世相史》海鸟社 1987 年
咲山恭三《博多中洲物语（后编）》文献出版 1980 年
福岡市兴行协会《博多・剧场 50 年的路程》福岡市兴行协会 1972 年
福岡市综合图书馆文学・文书课 编《咖啡馆和文学》福岡市综合图书馆 2002 年
《探索福岡之谜》福岡市文学馆 2006 年

***YUMANI 书房“合集・摩登都市文化”**

第 83 卷《朝鲜半岛的现代主义》西村将洋 编 2012 年
第 84 卷《台湾的现代主义》水谷真纪 编 2012 年
第 85 卷《满洲的现代主义》小泉京美 编 2013 年
第 90 卷《博多的都市空间》波濶刚 编 2013 年

●本稿属于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基磐 C “昭和摩登的开展/变化——1930～1940 年代东亚地区文化翻译的政治学”（课题编号：26370430）的部分研究成果。